

■台灣文壇大師白先勇早前在香港中文大學演講。



■講座吸引約七百名師生，全場爆滿。



■白先勇雖年過了旬，但心中依然有一團火，致力推動崑曲工作。

無悔青春 終生圓夢

白先勇

永遠的

青春是一場夢，在悠悠時光裡，那個夢曾經佔據我們的腦海，讓我們戀戀不捨。他說他一直在做夢，年輕時與一群同學創立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到今天七十多歲了，他的夢還沒有醒。而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則在他的夢想支撐之下，公開演出超過兩百場。

時間流轉，一晃眼五十年過去了，我們的思緒依然停留在那個少年白先勇身上，但真實的他臉頰泛紅，笑意盈盈的，那些辛辣、蒼涼的文字彷彿一去不復返，剩下的只有古樸典雅的眼前人。歲月雖然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跡，但他依然是我們最熟悉的白先勇。

他說：「我最想做的都已經做到了，我的人生沒有遺憾。」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：香港中文大學提供、資料圖片

「年輕的時候就喜歡做夢，夢一做就做了幾十年，我現在七十幾歲了，還在做夢，還不願意醒過來。」二十出頭的你在幹甚麼？忙學業，忙報告，還是忙着打工？白先勇說，上大學就是要做夢，大學生不做夢太可惜了。他的夢便是從大學三年級開始。

夢始·文學雜誌

白先勇回望過去，娓娓道來那段年輕瘋狂的歲月，聽起來，這麼近，那麼遠。當年的小伙子今天垂垂老矣，但熱血澎湃的心境，彷彿並沒有隨時間而消失，反而像他自己說的，他一生中覺得自己做過最有意義的事便是出版了一本文學雜誌，一本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對文壇影響深遠的雜誌。

華文文壇大概沒有人不知道《現代文學》雜誌，也知道是由幾個讀大學的小伙子一手創立的，但未必知道它是這群年輕人的夢。白先勇說，做夢好，夢愈多愈好。「那時候如果沒有夢想，我覺得青春會虛度。」

上世紀50年代，他在台灣大學外文系讀書，那時周遭的環境並沒有很開放，但校園裡殘存了一種五四的浪漫餘韻。他們這些戰後成長的年輕人普遍都帶有一種求新望變的情緒，白先勇坦言：「我們跟五四運動的學生有點像，有那種捨我其誰的感覺，年輕嘛，不知天高地厚，想創新。」他們認為文學就是他們的夢想，他們想再來一次五四運動。

在大學三年級的時候，白先勇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，那時歐陽子就說，想要做一件讓大家老了都可以回顧的事。有一天，白先勇興高采烈地提議，辦一本雜誌吧！說起來好像很容易，但幾個寂寂無名的學生在沒有資金的情況下，做到的事其實很有限。白先勇憶道：「那時候拉稿很不容易，沒有文章怎麼辦，自己來寫吧！一篇不夠怎麼辦，那就寫兩篇。」他顧諱地笑說，他覺得在同期裡發表兩篇文章很尷尬，為了湊夠稿子，他用了兩個筆名寫，而其中一篇便是他們熟悉的「玉卿嫂」。白先勇負責寫小說，其他人有的翻譯外國文學評論，有的幫忙設計封面，全部都是自己來。他們很幸運，第一期有余光中的詩，王文興又提議介紹卡夫卡，一切準備就緒，他們興致勃勃地騎着腳踏

車去印刷廠。

「我們只印了兩千本。」他記得很清楚，因為印刷廠的老闆那時都不理他們，嫌他們印得少，把稿子放到一邊就叫他們走。「我們立刻就要出版了，怎麼可以這樣！我坐在印刷廠裡，覺得好熱好熱，心想你不幫我，我就不走！」他們守在那，看着稿子印出來，幾個同學當場就在那裡校稿。

雜誌出來了，他們自己送到雜誌攤那邊去。「我們很期待，跑到雜誌攤去，跟老闆說我要《現代文學》！」白先勇開懷地笑說。後來一行人到照相店裡去照了相片，「那時是1960年5月9日，我們都是做青春夢的一群人。」

「回頭想一想，如果那時不做夢，不做一本雜誌，人生就缺了那麼一塊。」他們想要五四運動，想要新文學，心裡糊裡糊塗地，卻真的夢想成真了。與白先勇一起做夢的除了歐陽子、王文興、李歐梵、劉紹銘、陳若曦等創始人以外，還有走過那個年代，當時富有才情的大學生，如陳映真、黃春明等人，甚至也有中學生投稿，撰寫《香港三部曲》的施叔青便在雜誌上發表了第一篇文章。

「現在在台灣文壇有影響力的作家很多都在雜誌上發表他們的處女作，大家的夢都付諸在這本窮得不能再窮的雜誌上。」

夢回·改編崑曲

「我的夢一直醒不過來，退休後，一個偶然的機會，我第二個青春夢出現了。」2003年，他從一個思想前衛的作家走向古典的崑曲藝術，那個下筆潑辣、大膽的白先勇一頭栽進崑曲的世界裡，先後改編《牡丹亭》、《玉簪記》等傳統劇目，一做就做了八年。六十多歲的他心裡還有一團火，看到崑曲沒落，心裡隱隱有一種危機意識，如同年輕的時候一樣，一不做二不休，既然要做他就要做到底。

他說他與《牡丹亭》特別有緣，早在1946年便在上海看過戲劇泰斗梅蘭芳與俞振飛合演的《牡丹亭》之《遊園驚夢》，那時他才十歲。說起這個邂逅，

他特別興奮，「梅蘭芳平時不唱崑曲的，他們那一輩的人崑曲跟京劇都要學。抗戰勝利後，八年沒唱戲的梅蘭芳回到上海唱，剛好我家有票，去看的那一天，他演的正好是《牡丹亭》，唱得特別優雅、特別柔婉。」這是他第一次接觸崑曲，沒想到一別便是39年。

1987年他意外地又回去看崑曲表演。那時他受邀成為復旦大學的訪問教授，離開前他得知上海崑劇院正在上演《長生殿》，一看之下不得了，謝幕時他站起來拍掌，觀眾都離開了他還在拍，甚至跑到後台跟演員們聊天。「我很高興，不光是為了戲，也不是為了崑曲，而是這麼美好的中國瑰寶，在文革十年禁演之後，竟然可以浴火重生，大放光芒。」他聽到那些演員們在文革時期如何忍辱負重、默寫曲目、偷偷地唱，崑曲才得以被保留下來的事跡後，便知道自己心已慢慢為之着迷，難以自拔。

「佛家說動心起念。」後來他常常去看崑曲，發現崑曲一直走下坡，蔡正仁等那一輩的演員都退休了，中間沒有人接班，有斷層的危機。2001年，崑曲被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，連聯合國都知道崑曲的價值，白先勇以為一定會有人出來做點事情，但一直等不到，他開始焦急了。

人們常說第一次相遇是偶然，第二次是必然，那第三次就是命中注定，白先勇的青春夢注定要繼續下去。2002年，他在香港偶遇俞玖林，一看之下驚為天人，發現他的氣質、面相都很符合柳夢梅這個角色，有古代書生的味道。後來他又找到了演杜麗娘的蘇州姑娘沈豐英，剛巧兩個演員都是二十歲出頭，白先勇便親自策劃青春版《牡丹亭》，找來當代崑曲大師汪世瑜和張繼青，訓練這兩個年輕小演員。回想這一切，他笑嘆：「選人真的很困難，高一點不行，矮一點不行，胖一點不行，瘦一點不行，脖子長一點不行，連手的長短也有標準。因為水袖很長，手長的一揮出去不好看，手短的去揮不出去，身體的

比例要剛剛好。」

青春版《牡丹亭》2004年在台灣首演，六場九千多張票一下賣光了，白先勇知道很多人都等着看好戲，「看你白先勇到底在搞甚麼名堂。」演員們很緊張，他也很緊張，他還記得柳夢梅拿着柳枝發抖的情況。沒想到八年轉眼過去，從台灣、香港、內地到美國加州、英國倫敦等地，公演已經超過兩百場，演員們駕輕就熟，白先勇也說：「快告一段落了，『八年抗戰』也差不多來到尾聲。」

夢圓·回歸寫作

他是一個作家、編劇、教育家，這八年，他的讀者一直在等，等他回歸文壇，等他出新書，而白先勇一直知道自己的位置，很堅定地說：「我是一個作者，是一個寫文章的人。」

這幾年，除了推動崑曲，他忙得沒有時間做其他的事，但他不忘告訴讀者他的新書《父親與民國》會在五月出版，台灣時報出版社與香港天地圖書出版社將同步推出。我們還記得他寫母親，說她的離去讓白馬兩家同感天崩地裂，而他將用上下兩卷書的篇幅悼念父親，他說父親的一生如同一部民國史，透過描寫父親勾勒出民國的興衰。這部作品花了他好幾年的時間整理，因為父親的資料散落在內地、台灣、海外各地。除了收集資料，他還為圖片添加很多說明、注釋。一邊忙崑曲一邊寫作，難怪多年來他一直不肯透露新書的出版日期，免得開出空頭支票。

辦文學雜誌、推廣崑曲，還不忘為父親寫傳記，人生幾十載，他過得異常精彩，問他還有甚麼事想做，他說：「人一生中有很多事情要做，但我還蠻幸運，想做的事情都做到了。」現在除了看到以前的作品，覺得很幼稚、很想修改以外，他沒有任何遺憾。

當年初出茅廬，白先勇猶如在文壇投下一塊石子，泛起陣陣漣漪，大膽的文字、毫不避諱的情色描寫，寫下其悲愴的心境，也寫下同代人的故事。「重口味」的文風不僅讓評論家大開眼界，也成為年輕人進入文學世界的第一把鑰匙。我們的青春也一併留在那個寫《台北人》、寫《寂寞的十七歲》的白先勇身上。



■白先勇坦言，崑曲劇目選角非常困難，像沈豐英和俞玖林這樣的演員可遇不可求。

白先勇在香港

白先勇與香港有很深的淵源，他曾在1948年遷居香港，就讀九龍塘小學及喇沙書院，不久便移居台灣。以為他與香港緣份已盡，沒想到這裡是他後來投身崑曲界的「導火線」。他說他與香港特別有緣，因為他是在香港選中了《牡丹亭》這齣戲。

事源2002年，香港康文署邀請白先勇來這邊做四場崑曲演講，其中兩場的對象是中學生，打聽之下他才知道是來自四十多間中學1500多個學生，他被這個數字嚇到了。「我從沒教過中學生，還要跟他們講兩個小時崑曲，這是我教學生涯裡最大的挑戰。」白先勇不忘當年的情景，皺着眉頭說。他那時打俊男美女牌，找了四個演員來，有兩個便是後來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的演員，包括男主角俞玖林。兩個小時下來，那些孩子聽得津津有味，白先勇心想：既然中學生都通過了，那我找一些年輕演員，演愛情戲給他們看應該也可以吧！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便在白先勇遇上俞玖林之後，正式落實了。

後來，白先勇幾乎每年都會來香港，不是為了《牡丹亭》、《玉簪記》的演出，便是擔任學校的演講嘉賓。今年，他受邀前往香港中文大學開辦崑曲課程，學生反應熱烈。三月，白先勇擔任「崑曲研究推廣計劃」榮譽主任，未來將把重心投放在崑曲劇目整理的工作上。他笑言，對中文大學印象深刻，以往是他千方百計去哀求校長開辦崑曲課程，如今卻是中大校長沈祖堯主動找上他，邀請他來講崑曲。



■白先勇2009年獲中大頒授榮譽文學博士，以表揚他在國際文壇的非凡成就。